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情感与民族意志。保家卫国、和平安宁、追求生活的富裕安康一直是中华文明发展的主线。中华文化深深浸染于中国人的知、情、意之中，如同春风化雨，但又坚如磐石。

中华文明核心价值的独特性格

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塑造了这个民族最突出的内在性格和精神风骨。中华文明五千年薪火相传，既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砥砺前行，又在东西南北的文化交汇、冲突中融合、汇通，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价值体系，并随时代而发展，因遭际而变迁。千百年来，这一整套核心价值，就融会在中国人的生活里，构筑在中国人的心灵里，沉淀在中国独具特色的传统、风俗、情感中，铸就了我们的精神支柱，构建了我们的文化皈依和民族认同。其中一些观念，会由于历史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转化，但中华文化最精华的价值观念，却历经千年而不衰，衡诸四海而不替，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文明最重大的贡献，是今日中国进步的内在基因，是我们向世界寻求文化共识的基本立场。

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生成于中华民族的历史，也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中华文化的特征则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即独特性、包容性、和谐性。

独特性。中华文化的价值观自成体系。中国所处的独特地理位置，是我们文化成长的摇篮。一方面，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地貌等自然条件复杂多样，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生长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处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中，有利于区域内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在4000多年前，在中原地区出现了第一个王朝——夏朝，从此中国步入文明时代。在长江、黄河两大母亲河的哺育下，中华文化开始塑造自己更鲜明的特征。商周时期，中华文化已经非常成熟，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家族伦理和世界观体系，我们今天还能够看到的中国上古典籍《尚书》，就产生在这一时期。春秋战国之世，中国涌现了如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韩非子等大批的思想家、哲学家，也诞生了像《诗经》《离骚》这样伟大的文学作品。这是中国文化第一个光芒璀璨的时代，这些先哲的思想，至今仍旧是我们文化不竭的源



泉，尤其是儒家、道家和法家的思想，构成了后世中国文化的主干。中华文化以独特的风采屹立于东方，曾长期是世界文明的高地，今天在新的文明大交汇中也仍然为举世所瞩目——人类文明的新发展需要从东方智慧中吸取更多营养。

包容性。今天考古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不仅在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耕、渔猎文化，北部草原的羌戎地区、巴蜀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岭南地区，都是中华文化的起源地。中华文化既融合了中原文化、吴楚文化、巴蜀文化、闽越文化、北方草原文化、西域文化等域内众多地域文化的因素，也通过文明对话的多种通道，特别是历经千年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与世界各大文明广泛交流，这种独特的融合力、同化力是中华文化凝聚力的来源，也是中华文化生命力的保障。中华文化始终呈现“多元一体”的形态。东亚大陆的地理特征孕育了我们独立发展的文化本根，中华文化是“一体”的，它有着基础广泛、高度同一的主流价值观和文化精神；同时，我们的文化又是“多元”的，既融会域内各个民族、各个地域的文化特色，又广泛吸收域外各民族的文化精华。“开放包容”是中华文化长盛不衰的根源。

在历史上，我们经历过多次文化的交流与融会。如佛教传入后，便开始了中国化的过程，其思想精髓也成为宋明理学的组成部分，为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思想文化观念注入了关键的思想资源。对佛教思想的广泛吸

纳，使得南北朝以来的中国文化呈现出与先秦、秦汉迥然不同的面貌。从物质文化层面来说，我们的食品、种植物、器物、技术、科技知识等，也不乏众多外来文化因素。而中华文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汇入世界历史后的西方文明冲击。我们携带着自己的历史记忆前行，寻找中国与世界的契合点。

和谐性。长期的农耕文明，培育了中国亲和的天人关系和人际关系，也孕育了和谐的基本精神。中国地域广袤，处在适合农耕的纬度，长江、黄河和众多河流造成的冲积平原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的农业起源地之一，南方的稻作农业和北方的粟作农业构成了中国农业的两大系统。中国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不违天时，不夺物性，在这种亲近自然、寄身自然、归化自然的生活中，体会到和谐的真谛。

自古及今，我们中国人总是以和谐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以和谐的伦理精神为人处世，以和谐的情感与心灵体验世间美好事物，形成了以和谐为特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是“和而不同”的世界观。古代智者告诉我们，真正的和谐并不只是“求同”，也要“存异”。不同的事物、不同的因素相互协调，可以达到和谐共存的状态，可以实现世界的平衡，可以推动世界万物的发展。和谐犹如鲜美的食物来自不同食材的完美调和，犹如优美的音乐来自不同音符的美妙协奏。“和而不同”构成了中国人认知、看待世界的基本方法，既是人生的哲理，又是生活的智慧。

二是“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我们的先民在长期劳作中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在寒暑交替、日夜更迭、男女生死之中体悟人与自然的关系，探索宇宙的规律。在他们的意识里，人类并不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种自然观，决定了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亲和的。

三是“以和为美”的审美观。在中国人的现实与精神世界中，和谐不仅存在于天人之间、人际之间，更存在于情感与内心世界。中国人将和谐的审美体验化作多姿多彩的艺术创造。在古典艺术殿堂中，从诗歌、绘画到音乐、书法，都融汇着这种审美情趣。这种温柔敦厚、温文尔雅的中庸和谐之美，构成了中国艺术含蓄、虚静、空灵而意境深邃的风格，塑造了中华民族含蓄内敛、平和宽厚、朴实诚恳的民族性格。

四是“以和为贵”的处世观。和谐的世界观与和谐的审美观是个体走向社会人生的桥梁。和谐精神在处理人生、社会与家国的相互关系中表现为“以和为贵”的处世理念。中国人以和谐精神滋润家庭，协调邻里，善待他国。作为持家之道，中国人讲“家和万事兴”；作为邻里之道，中国人讲“以邻为伴”“与邻为善”“和睦相处”；作为国家之道，中国人讲“协和万邦”、以德怀远、相互信任。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汇通性

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创造了

为全人类所共享的文化价值的民族，因此，衡量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就是看这个文化中有多少为今日社会成员乃至于大多数人类成员所共知、共守的价值内核。一种文化的核心价值曾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自身的进程，是其历史贡献的标志；这种核心价值，是否为人类社会成员所共同体认，是其适合今日世界潮流的标志；这种核心价值能否与时俱进，是衡量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重要指标。最近看到学者刘梦溪先生的文章，他讲，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是人之为人、群之为群的、家之为家的、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伦理，这些价值理念，可以演绎为“仁爱、诚信、爱敬、忠恕、廉耻、和同”等概念。这些概念范畴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价值理念，既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今天，不仅适用于中国人，也适用于全世界。我以为这是对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关系的很中肯、深刻的理解。

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以来，救亡图存和文化自新一直是我们需要同时面对的巨大挑战。当西方开始地理大发现、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开启了文艺复兴和近代化历程的时候，中国开始落在了世界的后面。当我们面对西方炮舰的时候，一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摆在中华民族面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走过了一段艰辛曲折和充满屈辱抗争的历史，中华文化同样经历了自救和自强的艰难历程。

今天，我们在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国家的同时，也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道路上迈出了强有

力的步伐。今天的中华文化，不仅包含着古圣先贤创造的民族精神核心，也包含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伟大进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的崭新元素，包含着当代中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创造，更包含着中国人“睁眼看世界”，以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借鉴多样人类文明的成果，是一种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崭新文化。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正成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新特征。

中华文明同世界文明的汇通性，是现时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一个特征。过去我们总是更加专注于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差异性，而对其中的汇通性或共同性注重不够。2015年底，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届联合国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论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通过对当代中国和世界基本情况的分析，中国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和主张。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植根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借鉴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契合了世界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共同诉求，坚持以人为本，体现了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创造全人类美好生活的责任担当，也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指明了方向。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理念已经和正在为联合国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接受，相继被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这一事实表明，正在复兴进程中的中华文明以及蕴含其中的核心价值，正在影响着当今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当今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成员，中国与世界越来越融为一体。中华民族有着什么样的文化性格，今天的中国秉承什么样的文化价值，对世界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中国应该，也必须对世界文明作出自己更大的贡献！而这个贡献，不仅一定是基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基于自己民族的核心价值，也一定是基于当代中国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交融、汇通之中，基于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之上。这是当代中国人文化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春秋

恨不移封向酒泉

画卷开时塞外云（三）

□ 董泳洋

何好酒，也就是这样嗜酒如命以至超出常理性子才称得上“仙”。

杜甫说汝阳王爱酒，甚至想要将自己的封地改为酒泉，那么酒泉在唐代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汝阳王又多么爱酒呢？

酒泉，顾名思义，酒汇聚而成的泉，这样的泉水存在吗？据说酒泉城的地底下就有一眼如此神奇的泉水，味道香醇，与酒无异，酒泉也由此得名。酒泉最初就是汉武帝设立的河西四郡之一的酒泉郡，在历史上一直担当屏障中原的作用。它虽然是历史悠久的军事重镇，却不是一个发展经济文化的温床，相较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大城市如长安、洛阳，其繁华程度远远不如。李璡身为正经的皇亲贵胄，却甘心放弃富饶的封地和优逸的生活，来到边疆的苦寒之地，只为一解酒瘾，饮中八仙之名当之无愧。当然这里只是杜甫的戏谑，历史上李璡并没有真的“移封向酒泉”。不过如果以为这只是杜甫的异想天开，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酒泉作为酒徒的“乌托邦”岂会浪得虚名，在李璡之前还真的曾有一位资深酒鬼实现了“移家向酒泉”的宏愿。

下面隆重登场的这位名叫姚鼐，西晋时人。姚鼐虽然是羌人，但酷爱读书，又嗜酒如命，每次喝醉了就会大谈帝王兴亡的故事。他也擅开玩笑，所说的话非常幽默风趣。姚鼐常常感叹：“拿黄河九条支流的水加起来都不够浸泡酒曲，砍去天下八个泽藪的树还不够做酿酒时需要的柴火，把楚地七处沼泽里的麋鹿都杀了仍不够做下酒菜。人秉承天地的灵气精华而诞生，如果不知道喝酒的乐趣，只是会活动的躯壳罢了，既然如此天地又何必赋予‘木偶’意识智慧呢？”姚鼐喝酒喜欢直接喝酒糟，别人不喝水会渴，他不喝度数高的酒会渴。朋友们经常拿这件事情戏弄他，还给他取了个绰号“渴羌”。

晋武帝登基后，有一天突然想见下这个神奇的姚鼐，于是就召见他。晋武帝看到站在台阶下的姚鼐，十分惊讶他

居然长得十分倜傥，就想提拔他做朝歌邑的长官。姚鼐推辞道：“我是来自异域的一个年老的羌人，和这里隔了千山万水，能来到中原游历一番，已经非常幸运了。希望陛下能收回成命，只要能让我养养马，不时赐我一些美酒，快活地过完晚年就心满意足了。”晋武帝打趣他说：“朝歌原来是商纣王的都城，当地出产美酒，派你去那儿做官是为了让你这个老羌不再喊口渴。”姚鼐本来就爱谈国家兴衰之事，对于商纣王筑酒池等享乐无度导致亡国的故事也是了然于胸，因此当即就站在台阶下大声回答道：“我本是马厩的老羌，渐渐受到皇帝圣明的教化，四海之内的蛮夷羌狄，都是陛下的臣子，又怎么可能变成殷纣时期的百姓呢？”晋武帝听完十分高兴，随即就任命他为酒泉太守。姚鼐趁着醉意就接受了，走上上任。

姚鼐如此沉迷美酒，凭着机敏的应答就升任太守已经够令人惊奇的，然而他身上的神奇之处不止如此。一个资深酒鬼来到酒泉，就如龙入大海，人们会想当然地以为他会就此日日痛饮，大醉不止。可如果用这种想法去揣度姚鼐就小看他了，姚鼐到任后，并没有真的“今朝有酒今朝醉”，而是喝酒与处理政事两不误，颁布了许多有利于百姓的政令，造福一方。当地的民众感激他的恩德，还给他建了生祠。酒徒做到这份儿上已经是空前绝后了，但姚鼐还不满足。人们常说“酒色伤身”，酒喝多了危害身体健康。然而姚鼐一辈子无酒不欢，时时痛饮，却依旧轻轻松松活到了98岁，长寿令他又可以享受到更多的美酒，實在是“酒”生赢家，令后世的酒徒们羡慕眼红。

古代没有蒸馏技术，而自然发酵出来的酒精含量又有限，所以酒的度数不像今天的白酒动辄五六十度，比如有名的花雕也就20多度。所以古人的文章大多数时候并不是“醇厚”而芳香四溢的酒浸泡出的，而很可能带着一股淡淡的“水”味。

（上接1版）

同西方渗透作斗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与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中开展的。西方敌对势力并没有因为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搞意识形态输出，就放弃对中国的渗透和入侵，而是千方百计地对中国进行渗透，这种渗透包括意识形态的，也包括其他途径；特别是互联网的兴起，更为这种渗透提供了难以察觉的便利条件，使得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更加复杂尖锐。必须认识到，西方的这种渗透与正常的国际交往有着本质的区别，本质上是要瓦解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改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因而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面对这样的渗透，必须擦亮眼睛，旗帜鲜明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各种途径予以有力的驳斥和反击。

同分裂势力作斗争。中国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新变化，加之国内宗教极端思潮的抬头，境内外各种势力相互勾结、里应外合，“港独”“疆独”“藏独”“台独”等轮番上陣，试图分裂中华民族大家庭，阻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程。对此，必须采取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和军事等在内的各种手段，进行严厉惩治与打击。历史终将证明，分裂势力是不得人心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同霸权主义作斗争。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并没有使一些西方国家放弃冷战思维，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变本加厉地推行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中东地区的混乱不安，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强权势力插手与破坏的结果。中国南海问题的出现，实际上也是某些西方国家作乱与搅局的结果。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战而无备。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面对一些国家搞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收敛、不收手，中国必须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做好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领域进行全方位斗争的准备。

“伟大斗争”的基本边界

从一定意义上说，哲学发挥着对客观对象划分边界的功能。它以理性态度去科学厘清对象的边界问题，把握其与相关对象的本质区别，进而揭示出对象的特殊规定性。因此，区分与划清“伟大斗争”的边界与底线，避免片面理解和歪曲解读“伟大斗争”的真正含义，是十分必要的。

伟大斗争是有原则、有底线的斗争。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不是要搞革命年代疾风骤雨式的武装斗争，不是要搞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是以始终遵循社会发展规律、始终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始终坚持党的宗旨与使命为前提的，是在民主和法治轨道上展开的斗争，是在维护正常社会秩序前提下展开的斗争。最为明显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把党和国家工作纳入法治轨道，坚持依靠法治手段解决各种复杂的社会难题，坚持运用法治手段开展伟大斗争，有效保障了社会生活的和谐与有序。

伟大斗争是坚守人民立场的斗争。进行“伟大斗争”并不是挑起群众斗群众，在群众中制造矛盾和纷争，恰恰是为了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而开展的，因而是有立场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始终认

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蕴藏着伟大的力量；党的力量在人民，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要想打赢“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坚守为了人民的基本立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紧紧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伟大斗争是具有灵活性的斗争。从哲学上来看，斗争既包括使用暴力手段的剧烈斗争，也包括使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所开展的斗争。有认认真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在进行伟大斗争的过程中，面对不同的矛盾与问题时，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同一性的化解方法，对敌我矛盾采取对抗性的斗争形式。

伟大斗争是为达到和谐与和平目的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融入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因此，在新时期开展的伟大斗争，本质上是为达到国内和谐与国际和平为目的的斗争。就国内来讲，通过开展同错误思潮、固化利益、腐败现象、分裂势力的伟大斗争，营造安定有序和谐的社会环境，凝聚起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与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有利条件。就国际来讲，通过开展同错误思潮、西方渗透、分裂势力、霸权主义的伟大斗争，创造出让安定、和平、友好的国际环境，以利于充分发挥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重要作用，以利于积极推动人类追求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作者系中央党校图书馆馆长、教授，中央党校科研干部部）